

香港中央書院

中央書院於一八六二年創校，是香港首間由殖民地政府開辦和全數資助的學校。校名於一八八九年更改為維多利亞書院，再於一八九四年更改為皇仁書院。中央書院為市民提供高小和中學教育，由開辦至一八九〇年底理羅士女子中學落成的多年間，一直是本港唯一的官立中學。

2. 中央書院的歷史遠遠超過一個世紀。正如上文所述，校名原為中央書院，於一八八九年更名為維多利亞書院，再於一八九四年改為皇仁書院——這個校名沿用至今。在過去的歲月裏，學校曾多次遷址。一八六二年中央書院創校時的原校舍位於歌賦街，一八八九年遷往鴨巴甸街和士丹頓街交界處面積較大的地方，一九五〇年再遷往維多利亞公園對面高士威道現址。

3. 中央書院的創辦歸功於牧師理雅各博士（一八一五至一八九七）的努力。理雅各博士是傳教士，也是漢學家，以從事中國經典的翻譯和註釋工作而聞名。來港前是倫敦傳道會位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校長。一八六〇年七月，理雅各博士獲委任為新成立的教育局委員不久，就提出一個改革香港教育制度的計劃，當中的多項建議便包括創辦由政府管理的中央書院。

4. 鑑於理雅各博士在教育局的影響力甚大，而當時的總督羅便臣爵士也表示支持，因此創辦由政府管理的中央書院的建議很容易便獲得接納。一八六一年一月總督批准有關建議，同年三月立法會授權購買歌賦街的地皮興建校舍，中央書院遂於一八六二年二月開學。充滿幹勁的教育家史釗域先生（一八三六至一八八九）獲委任為中央書院首任校長（擔任此職至一八八一年），同時兼任教育局視學（現時教育署署長的前身）一職。

5. 中央書院的創校標誌着本港公眾教育的發展邁進新的階段。香港在殖民政府統治初期，香港島上的教育由本地華人開辦的幾間小型中文學塾提供；殖民地政府只是在一八四七年才開始向部分早期開辦的中文學塾提供資助。當時的公眾教育大體由教會學校提供，教會學校實際上並沒有得到政府的經濟援助。中央書院的創辦顯示政府既有意對教育進行世俗化的革新，也有意建立一套自己的學校制度，由政府全權控制。此後，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教育限於世俗範疇，官校不提供宗教教育，有關政策一直沿用至今。

6. 中央書院為華人在學習西方知識和了解世情方面打下堅實的基礎。中央書院的課程以西方的“世俗”教育模式為基

礎，以各種技術和科學科目作為教學重點。舉例來說，課程引進並加入代數、算術、化學、幾何學和地理等科目，以填補當時認為中文學塾以傳統方式提供教育所欠缺的知識範疇。因此，在中央書院接受教育的學生相對於在內地接受教育的學生來說，對世界更為了解，對西方思想也較容易接受。

7. 中央書院相當注重和重視英語教育，這一點突顯了其創辦的重要性。一八六五年，中央書院把英語列為高級班必修課，而預備班也有教授英語。由於政府辦公室和洋行對傳譯員和翻譯員的需求甚殷，不僅香港如是，中國各通商港口也如是，因此學習英語有極高的實用和商業價值，英語教育遂一直深受本港市民歡迎。

8. 此外，中央書院的文化環境也有助華人青年發展自由的人生觀和更具世界視野。書院最初只收華人男生，但由一八六六年起開放給非華人男生入讀。其後年間，書院的男生有英國、日本、意大利、葡萄牙、美國、菲律賓及其他不同國籍。於一八八二年到書院任職的第二任校長胡禮博士已可聲稱十二個國籍的男生在其統率之下。一八八九年，除了 790 位中國籍和歐亞裔學生外，中央書院還有 131 位註冊男生，分別屬於不同宗教和國籍（他們包括英國人、希伯來人、德國人、日本人、穆斯林、葡萄牙人、一名印度人和一名帕西人）。

9. 新引入的課程，加上稱職和能幹的校長，以及訓練有素的教師，中央書院越來越受本地居民的歡迎，申請入讀人數遠超於收生限額，就以一八七一年為例，中央書院的學生人數佔全港學生總人口的 9.2%(249/2706)，一八七七年的比例更升至 11.4%(455/4003)。

10. 中央書院的重要貢獻是為社會培育精英。書院的畢業生以其雙語才能和跨文化經驗為香港和中國服務，當中很多成為了香港社會的領袖人物，在商行和中國政府中位居要職的為數也不少。舉例來說，香港總督寶雲爵士在一八八四年的授獎演講日中宣布，12 名中央書院學生應邀出任中國朝廷的官職。此外，也有部分舊生在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革命運動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11. 中央書院不少舊生成就非凡，名留中國和香港歷史，其中包括（按英文名字的字母序）何福議員（一八六三至一九二六）、何啓爵士（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四）、何甘棠先生（一八六六至一九五〇）、何東爵士（一八六二至一九五六）、劉鑄伯議員（一八六七至一九二二）和孫中山先生（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孫先生早年在夏威夷讀書，於一八八四年入讀中央書院，當時 18 歲，其後在一八八六年離校繼續接受高等教育。